

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的亞太政策

金榮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日本首相宮澤喜一 (Kichii Miyazawa) 於今年一月訪問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汶萊，並在曼谷發表政策演說。在這次的演說中，日本的新亞太政策——「宮澤主義」正式宣佈，主要內容包括日本將在亞洲的安全問題上採取更積極的作法，但絕不會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在經濟上則促成建立自由貿易體制及共同經援東南亞的未開發國家，並力圖消除東南亞各國對日本的疑懼等。^①

日本的外交政策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跟隨著美國的領導，可是隨著本身經濟力量的茁壯和美國逐漸從亞洲撤出其駐兵，日本在亞洲事務上的聲音和影響力愈來愈大。日本的亞洲政策也因之而改變，這種演變的過程為何？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第一個重點。此外，整個亞洲的外在環境在後冷戰時期有了十分重大的改變，這些變遷乃成爲日本新亞太政策的背景。本文的第二部分即試圖去探討新政策的背景及內容重點。

亞洲各國對於日本政策轉變的反應如何呢？韓國和台灣曾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曾備受日本侵略之苦，東南亞各國對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的占領記憶猶存，整個東亞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一直抱著疑慮的態度。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反應是本文的第三個重點。最後，本文將討論日本新亞太政策中對中共的認知及其扮演的角色，同時做爲本文的結論。

二、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外交政策之演變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身爲戰敗國的日本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處在美國的陰影之下。從一九四五年到五二年的美軍占

註① 有關宮澤主義的內容，請參閱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 January 28, 1993, pp. 10~11 和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1, 1993, pp. 1 & 3.

領時間，日本的外交政策自然是由美軍所主導。美軍結束占領後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日本的外交政策都追隨美國的領導，鮮少有自我的立場。^②

雖然如此，除了日美雙邊關係之外，日本在此時期外交的重點則放在對東亞其他國家的關係上。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時就一直以亞洲的主人自居，並曾經闡揚「亞洲門羅主義」——亞洲事務由亞洲人（當然指日本人）來解決。^③在經濟上，日本在戰前則大力提倡「大東亞共榮圈」（co-prosperity policy for East Asia），儼然把包括中國大陸的整個東亞納入其勢力範圍之內。是以日本雖然是戰敗國，和東亞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點。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在戰略上鼓勵日本和東南亞各國重建關係。在韓戰爆發以後，中共、蘇聯、北韓等共產國家對亞洲地區的威脅與日俱增，美國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乃在亞洲各國次第實施。再加上東南亞各國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美國需要日本過去在這地區的經驗以及日本這個幫手，以達到促進此地區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之目的，才能對抗共產主義在此地的擴張。^④

日本本身經濟上的考量也是因素之一。東南亞各國的天然資源一直是日本各種主要工業的提供者，再加上此地區處於中東地區原油輸往東北亞的樞紐，日本在戰後一直對東南亞各國的經貿花下很大心血。到了一九五〇年代中期，日本已是印尼和泰國最大的貿易國家，在菲律賓和馬來亞也僅次於其殖民母國——美國和英國之後。^⑤

在上述的各項因素之下，日本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發展出一套「政經分離」的外交政策。^⑥在政治上，日本跟隨著美國的步伐走，並且儘量在國際政治上保持低姿態；然而在經濟上，則由政府配合民間企業，共同在國際市場謀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有學者把日本這個階段的外交政策形容為「外交經濟政策」。^⑦

註② 有關戰後至一九七〇年日本的外交政策，參閱 Olson, Lawrence, *Japan in Postwar Asia*, New York: Praeger, 1970; Hellmann, Donald C., *Japan and East Asia: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Praeger, 1972; 及 Inoguchi, Takashi, "Japan's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 in Ellison, Herbert J., (ed.) *Japan and the Pacific Quadrang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註③ 參閱 Eto, Shinkichi, "Evolv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Katz, Joshua, & Friedman-Lichtschein, Tilly C., (eds.) *Japan's New World Role*, p. 49.

註④ 參閱 Saito, Shiro, *Japan at the Summit: Its Role in the Western Alliance and in Asian Pacific Coop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11~15. 英國政府也鼓勵日本重新和東南亞各國接觸，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註⑤ Saito 用「美—日—東南亞聯線」來形容日本當時以東南亞的原料，到日本加工，再賣到美國的產銷模式，這模式成功的把日本的經濟從戰後中復原。詳情參閱 Saito *op. cit.*, pp. 13~14.

註⑥ 從一九五二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為止，日本一直採取此種政策，日文稱之為「Seikai bunri」。詳情參閱 Nester, William, "The Third World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Newland, Kathleen,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London: Macmillan, 1990, pp. 71~99.

註⑦ Drite, Reinhard, *Japan's Foreign Polic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8.

在此階段，由於軍事上受到美軍的保障，軍事支出極少，日本得以儘全力在經濟上發展，結果是極有成效的。至一九六四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已經是全球第六大，並獲准加入屬於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更有甚者，日本的GNP在一九六六年超過義大利，一九六七年超過英國，一九六八年超過法國，最後在一九六九年超過德國，成爲自由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力量。^⑧至此，日本的「政經分離」外交政策大爲成功。尤其在亞洲，以前日本以軍事力量無法達成的目標，靠經濟力量就輕鬆達成了戰前「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

不過日本和中共的關係應該是此階段日本和美國有不同看法的地方。自從韓戰爆發以後，美國對中共就放棄建立外交關係的希望，並採取「圍堵政策」以對抗蘇聯和中共擴張主義。在這個原則之下，美國自然要求日本和民主陣營採取同一步驟來制裁、圍堵、對抗中共。

在日本方面，戰後的日本主政者卻對中共抱著不同的看法。以吉田茂首相（Yoshida Shigeru）爲例，他就認爲共產主義和中國是不相容的。^⑨而一般日本大眾對於中國的傳統友情和對中國文化的喜愛也是影響日本政治領袖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在外交上雖然不得不接受美國對中共的圍堵政策，可是在文化及經濟活動上，日本就和中共走的十分密切，尤其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眾多人口和廣大市場，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

在這種狀況下，日本在一九六〇年代對於中國問題採取了一種「事實上二個中國」（de facto "two-China" policy）政策。^⑩一方面日本和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並且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國；但另一方面，日本透過各種經濟、文化和政治性的團體和中共保持廣泛的接觸，日本也是中共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後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和中共正式建立邦交，比美國提早六年。這些均顯示出日本在處理中國問題的靈活性和自主性。

日本的外交政策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逐漸面臨改變的壓力。一些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得日本的外交決策者重新思考跟隨美國步子的作法是否妥當，這些因素包括美國於一九七一年宣佈放棄美元和黃金的固定匯率，一九七三和七四年的石油危機，一九七五年的越戰結束等因素。^⑪這些事件很明顯的指出一件事：美國已經不能再像以前一樣獨霸於全球，不論是經濟、政治上、甚或軍事上，日本都有必要因此調整其角色以及外交政策。

註⑧ Ibid., p.9.

註⑨ Ibid., p.7.

註⑩ 有關日本對中國問題的作法和政策，參閱 Hellmann, Donald C., "Japan and East Asia," pp. 73~78.

註⑪ 參閱 Saito, Shiro, *Japan at the Summit: Its Role in the Western Alliance and in Asian Pacific Cooperation*, pp. 50~54.

在這些事件中，石油危機對日本所產生的衝擊最大。日本的石油需求中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從國外進口，大部分是由中東輸入；而中東的石油則控制在以美國為主的七大石油公司手中。在石油危機時，美國的石油公司決定優先把石油供應給美國，而削減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國家之供油量，這事件使得日本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至此日本社會在石油危機發生不久後即迅速達成一個共識：把自己的安全完全放在別的國家手中是不可靠，甚至是十分危險的。

在這種共識之下，日本政府在某些重要的政策上，開始不再完全以美國的外交政策或利益為準，而逐漸有本身的外交政策。以石油危機的政策而言，日本即沒有跟隨美國的親以色列立場，而和大部分歐洲國家一樣的採取親阿拉伯國家的立場。^⑫當時的田中角榮首相 (Kakuei Tanaka) 即採取「資源外交」(resources diplomacy) 來凸顯各種資源對於日本的重要性。日本的資源外交除了阿拉伯原油外，尚包括印尼的煉鋁業、新加坡的石油化學工業、巴西的木材和鈾礦業等。^⑬

日本外交政策的轉變經過數年的摸索和嘗試後，到一九八〇年的「綜合國家安全報告」(Report o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時已然成形，這份由當時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Ohira Masayoshi) 所發佈的報告明白指出，隨著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已無法維持超強和保障盟國的安全時，日本有必要在三方面努力：努力使整體國際環境轉向有利的方向、自立自強的努力以面對威脅、以及和有共同理念和利益的國家合作來達到安全的目標。^⑭

在這些目標下，日本即開始充實軍力，使日本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軍事費用支出僅次於美、蘇的全球第三位，日本的軍事預算從一九七四年的一萬零九百三十億日元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三萬一千三百七十億日元。^⑮這些都是要達成自立自強的努力以面對威脅之目標。此外，日本也隨著自身經濟力量的提昇，開始在國際事務上更積極的參與並發揮影響力，以「使國際環境轉向有利的方向」。

一名日本學者 Takashi Inoguchi 歸納出日本一九八〇年代外交政策的四大方向：和美國的安全合作、擴增日本的軍事力量、加強和西太平洋國家之關係、以及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⑯拿這時期的日本外交政策和一九七〇年以前的相比，很明顯日本已從以前的日美關係為主的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性的外交政策，以配合日本經濟實力日益強大所產生的影響力。

註⑫ Drifte, Reinhard, *Japan's Foreign Policy*, pp. 28~29.

註⑬ 「資源外交」的名詞是日本學者 Saito 所用來形容當時日本在能源危機後外交的新方向。參閱 Saito, pp. 40-42.

註⑭ Drifte, op. cit., pp. 28~31.

註⑮ Drifte, op. cit., pp. 32~36.

註⑯ 參閱 Inoguchi, Takashi, "Japan's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 in Ellison, Herbert J., (ed.), *Japan and the Pacific Quadrangle*, pp. 81~105.

綜觀日本戰後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日本的外交政策，吉田茂首相所制訂的外交政策「致力於經濟發展、政治上採取被動」三十年來把日本從戰敗的廢墟中轉變為一個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其成效的確十分成功。^①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他的回憶錄中即稱許日本那時期的外交政策是最有遠見和明智的。^②在這期間，美國曾經在韓戰爆發後派特使赴日本希望日本重整軍事力量，也被吉田茂拒絕，因此在無軍費負擔下，才使得日本的經濟恢復得如此迅速並有成效。^③

三、宮澤喜一新外交政策的時代背景和內容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整個世界局勢和以前有很大的轉變，最重要的是冷戰的結束改變了全球原來民主和共產集團對峙的局面，不同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主導全球政經發展的力量。在歐洲，隨著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倒塌和東歐各共產國家的瓦解，使得共產主義在二次大戰後風靡於亞非各國的景象也不復再見。僅存於亞洲的中共、越南也紛紛改走市場經濟以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而最頑固的北韓則是處於最孤立的狀態。這些結構性的改變均顯示出過去冷戰期間一些重要問題如洲際飛彈、核武、星戰武器等都被現在的決策者拋棄，而這些決策者目前所傷腦筋的則是另外一些問題。

在這些新問題中，種族、宗教、和經濟等問題最引人注目。南斯拉夫即為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個國家由數個不同種族和宗教的族群所組合，在一次大戰前就是歐洲衝突的引火點之一。二次大戰後被蘇聯併入共產國家，靠著當時領袖狄托（Josip Brozovich Tito）的個人威望和靈活手腕，還能維持南斯拉夫共和國的統一。等到脫離蘇聯的控制後，各族群之間的猜疑和生活習慣不同等因素立即使得這個聯邦分崩離析，並弄得境內烽火連天，儼然成為歐洲的火藥庫，究其原因，境內不同的族群和宗教信仰實是引起戰亂之主因。除了南斯拉夫以外，伊拉克、南非、原蘇聯之各共和國、甚至英國、美國之種族問題都是未來混亂的根源。

經濟和貿易問題則是困擾已開發國家的最大問題。美國近十餘年來的貿易赤字以及數兆美元的龐大赤字，一直是決策者揮之不去的陰影，也是美日關係的最大障礙。歐洲各國也好不到那裡去，西歐各國平均百分之十一的失業率在可預見的將來

註① 吉田茂所訂下的原則不僅其在位時實施，後來的首相如池田（Ikeda Hayato）、佐藤榮作（Sato Eisaku）等均遵循吉田政策。可說是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

基石。參閱 Pyle, Kenneth B.,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Role" in Ellison, op. cit., pp. 190~191.

註② 參閱 Pyle, op. cit., p. 188.

註③ Pyle, op. cit., p. 189.

都不會獲得顯著改善，而最近兩年的經濟衰退也使得原本對歐洲整合充滿希望的許多歐洲人改變想法，並重新思考福利國家的制度是否做得太過份，以致使許多人不願意努力工作。^⑳原來表現最好的日本也為近二年泡沫經濟之消退所產生的經濟衰退而困擾不已。近年的七國高峰會議討論的焦點也從以前的安全及政治等問題轉向經濟及貿易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比以前的問題更難解決，因為這些問題的對手就是與會的其他人士，當這些人各有其國內的種種壓力時，協調起來其困難重重是很容易預期的。

一九九〇年代全球性的另一個轉變是全球經濟的區域化。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到一九七一年美國放棄美元對黃金的固定匯率時是美國經濟獨霸的時代，美國在此時期成功的維持了全球經濟的穩定和成長，然而美國本身也為維護此制度而種下經濟逐漸走下坡的根由，^㉑當然美國軍事費用的支出過鉅也是原因之一。^㉒而根據吉爾朋(Robert Gilpin)和克萊史勒(Stephen Krasner)的理論，政經霸主的消沈不可避免，會導致自由貿易秩序的崩潰，^㉓代之而起的則是另一套貿易規則。

在一九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世界各國都在兩次石油危機所造成的經濟混亂中找尋自我的定位。而在這段期間內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則是最令其他國家側目，年平均約百分之五的成長率，使得日本的經濟規模在一九九〇年達到美國的百分之六十，而在一九五〇年時，日本的經濟規模祇是同期美國的百分之五而已。^㉔經濟力量的強大代表了貿易順差和其他對手國的失業率上升、競爭力衰退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即迅速轉化成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

面對這些壓力，西歐各國終於決定在一九九三年組成單一市場，在這市場內，人口、貨物及資金均可以自由流通，並最遲於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成立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一九九九年一月起發行單一貨幣——歐元(Euro, 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㉕單一市場對於區域內的經濟統合，有莫大的助益，然而對區域外的國家而言，一個新的貿易壁壘是毫無疑問的。

註⑳ 參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12, 1993, p. 1, Molly O'hell's article.

註㉑ 按照 Arthur Stein 的說法，經濟獨霸的國家如十九世紀末的英國和二十世紀中的美國通常會採取一些經濟政策而導致本身經濟日趨下坡，這即是他所說的「獨霸的兩難」(Hegemon's dilemma)。參閱 Stein, Arthur, "The Hegemon's Dilemma: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Spring 1984), pp. 365-386.

註㉒ 這是 Paul Kennedy 的著作，參閱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註㉓ 參閱 Gilpin, Robert,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參閱 Krasner, Stephen,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註㉔ Nye, Joseph S., Jr., "Coping with Japan," *Foreign Policy*, number 89, winter 92-93, p. 97.

註㉕ 參閱鄭志科，「歐洲經濟區域之形成及其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二期(民國八十二年二月)，頁七四-九二。不過近二年來的發展，已使得歐洲中央銀行和單一貨幣的計畫將有所修正，並極可能往後延期。

在歐洲單一市場的刺激之下，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乃簽訂條約同意建立一個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在亞洲方面，一個以東協六國為主的經貿區域組織也正在東亞各國間尋求共識中。²⁶當貿易總額占全球的八成以上之三大經濟地區均組成形式不同的經貿組織時，全球經濟貿易的地區化已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此外，在亞洲方面，另一個趨勢就是亞洲人決定亞洲事務的時代已經來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亞洲大部分是歐美各國的殖民地，亞洲各國人民的自卑情結和想自強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戰後好不容易亞洲各國獲得獨立，然而四十餘年的冷戰又把亞洲各國變成美蘇二強鬥爭的籌碼，再加上剛獨立的國家大都受到內戰、不同意識形態間的鬥爭、軍人干政等因素的干擾，而無暇於經濟發展，自然也就無從提昇亞洲各國的政經地位。

這種情勢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有了很大轉變。首先是美蘇冷戰之結果造成近乎兩敗俱傷的局面，雙雙自亞洲地區撤退，轉而從事本身內部的經濟重建工作，一般認為要想在本世紀內達成重建的目標仍然是十分困難。再者是亞洲各國的經貿力量快速增長。日本已是全球第二大經貿國家；中國大陸經過十餘年的快速發展，加上台灣和香港，已被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預測為十年內經濟力量足以和德國、日本分庭抗禮。²⁷南韓和東協各國近年的經濟發展不僅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準，也帶動整個亞洲地區人民的自信心。

在前面幾個因素的影響下，日本的宮澤喜一首相即適時提出日本政府的新亞太政策，以反映近年來全球性和亞洲地區的新情勢。這次「宮澤主義」的主要原則有下列數項：日本和東亞各國協力共同建立一個亞洲區域安全體系；日本並沒有重建軍備的意願；和東協等國家共同探討開發中南半島的計畫；在美軍撤離菲律賓和中南半島的非共化後，日本將更增進和東南亞各國相互依存的關係。無疑地，這將是日本九十年代亞太政策所努力的目標。

在這些重點中，建立亞洲區域安全體系是最值得重視的。如前所述，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儘全力於經濟外交，有關軍事安全的問題都丟給美國去傷腦筋。四十年的休養，已使得日本的經濟力量今非昔比，對自己充滿信心。再加上美國的逐漸撤出亞洲，整個亞洲的安全即面臨一個很大的衝擊和轉變。亞洲區域安全體系的構想即在此種背景下提出，以日本為主的力量來填補美國所留下的空檔。唯東亞各國，包括中共、南韓、東協各國等仍對過去二次大戰時日本軍閥窮兵黷武之情景深感疑懼。為了消除各國之疑懼，宮澤首相即再重申日本並無重建軍備的意願，並表示未來的安全體系祇是提供亞洲各國一個有

註26 目前東亞的經濟整合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即是這經濟集團是否要包括美、加，或者是否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及香港三方面，不同的組成份子會對此集團的經貿運作定出不同的規則。

註27 見聯合報，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一版。

關安全問題之對話場所，目的是建立互信和防範誤解和衝突，並無其他的用意。當互信建立後，武器管制和削減自然成爲下一階段的任務。²⁸

「宮澤主義」的另一個重點即爲和東南亞國家共同開發中南半島。中南半島的越南、柬埔寨、寮國近年來都從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逐漸走向市場經濟，而另一個東南亞國家——緬甸也逐漸被迫開放其市場，以提高人民的經濟水準，並緩和民怨。雖然如此，這四個國家和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比較起來仍然是十分落後和貧窮的未開發地，而這一億二千萬人口的潛在市場也是在商言商的日本人眼中之一塊大肥肉。²⁹因此不論從商業利益或者緩和和本地區的緊張關係來說，日本和平開發中南半島的主張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一貫立場之一，也有其必要性。

「宮澤主義」所透露的另一個重要訊息則是日本已走出戰後所產生的定位不明之陰影，明確的指出一個和平而穩定的亞洲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點，日本不能也無法像以前一樣的逃避它對亞洲所負的責任。以前日本在美國強勢外交的陰影下時，一心一意以賺錢爲主要目標；現在身爲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強權，日本無法再蹈襲以前那種政策了。日本有必要並已經規劃其在全球的角色和應該負擔的責任，亞洲是日本的第一步，日本應會逐步提出對其他地區的外交政策。³⁰

至於「宮澤主義」的政策中，中共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是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看待？抑或是一個潛在的威脅，一個需要用亞洲安全體系來加以監控的對手國？不同的觀點會產生不同的因應政策。這點是「宮澤主義」的盲點，並沒有加以說明。本文將在最後的結論對此加以說明。

四、東亞各國對於日本新亞太政策的反應

一般來說，東亞各國對於日本的新亞太政策抱着一種頗複雜的心態。一方面各國殷切盼望日本能落實援助及投資計畫，同時能切實執行其提出的區域安全體系計畫，以對美國逐漸撤離後的亞洲安全提供一層保障；此外，他們也希望日本能拿出領導者的態度、更開闊的胸襟來對待亞洲各國。也就是說，日本想要領導東亞各國，首先便是要成爲能爲此地區接受的一個

註²⁸ FEER, Jan. 28, 1993, pp. 10~11.

註²⁹ 日本一直是緬甸最大的貿易往來國和外援者，到一九八八年爲止，日本提供緬甸計三十八億美元的外援，是緬甸所有其他外援總和的四倍。參見 Nester, William, "The Third World i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 Newland, Kathleen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pp. 79~84.

註³⁰ 根據 *Foreign Report* 之報導，日本的通產省(MITTI)將於十一月在美國所舉行的亞太經合會的高峯會(APEC)時提出一份雄心勃勃的亞太地區投資計畫，以促進整體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一個例子即是所謂「亞洲車」的製造，經由亞太各國的零組件製成，如此一來可以避免亞洲各國的抗拒，再者又可提昇亞洲各國的經濟。詳見 *Foreign Report*, London, 2247 March 11th 1993, pp. 1~2.

國家。

另一方面，東亞各國在二次大戰大都有被日本殖民或占領的經驗，這些經驗一直是各國深惡痛絕的。因此，東亞各國對於日本現在侈言建立以日本為重心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均持著極為疑慮的態度。尤其日本戰後的復興極為迅速，而其經濟力量早已達到以前軍事力量所無法征服的目標，如果再讓日本武裝起來，南海豈不快成爲日本的瀨戶內海了？在這種複雜的心態之下，我們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也就不足爲奇了。

以中共來說，由於中日二國均以亞洲的領導者自居，中共對日本試圖建立亞洲安全體系的做法之反應是頗爲謹慎的。在「宮澤主義」演說發表後，人民日報即在一月十九日的一篇報導中以一千字的篇幅介紹宮澤喜一的亞洲新外交政策，並指出日本今後要在亞洲發揮政治作用，文中並無任何評論。^①可是在香港發行的文匯報和大公報就沒有這麼客氣了。在一月二十二日的特稿中，文匯報記者就藉由東協各國媒體之報導而質問日本是否真的不會再成爲軍事強國，並指出宮澤此行並沒有消除亞洲人民對日本的疑慮和戒心。^②此可顯示出中共對日本的新亞太政策仍然抱著「疑慮和戒心」的。

鄰近日本的南韓也大致表示出類似的疑慮。南韓現階段仍把軍事安全的重心放在駐韓美軍的身上，金泳三當選韓國大統領，即修書美國柯林頓總統要求保證駐韓美軍的繼續駐守，以確保朝鮮半島的安全。對於亞洲安全體系，南韓是基於只要能促進東亞的和平和安定都加以支持之原則，然而對於可能的日本軍國主義之復甦，則是抱著嚴加譴責的態度。

至東南亞各國，則是態度各異。以泰國言，應是東協中最友善者，這是宮澤喜一選曼谷做爲發表其新亞洲政策的主要原因。泰國總理川立佩(Chuan Leekpai)在和宮澤晤談時即指出泰國樂意看到日本在政治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但不希望日本成爲地區性的警察。^③後面這句話也是所有東協國家共同的聲音。新加坡大致和泰國抱持同樣的態度。

至於和中共有領土紛爭的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在美軍撤出菲律賓的蘇比克灣(Bay Subic)後，中共在南沙群島的主權主張不但使得這些國家大幅購買武器，也期待一個亞洲安全體系的建立來解決安全及軍事上的問題。最理想的方式則是美軍繼續留守東南亞，其次是建立一個由美國所主導的亞洲安全體系。菲律賓的外長羅慕洛(Robert Romulo)在訪問日本時即指出，日本不應該成爲區域性的警察，也不要寄望能填補美國所留下的權力真空。^④顯示出東南亞各國對日本重振軍力之深厚疑慮。

註① 人民日報，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九日，第六版。

註②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版。

註③ FEER, January 28, 1993, p. 11.

註④ Japan Times, February 5, 1993, p. 3.

對於東南亞的最大國家——印尼而言，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經濟上日本是印尼的最大出口國，外援的最大提供者，外資的最大投資者；政治上，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的占領促成了戰後印尼的獨立。因此在官方，印尼一直期望日本能繼續擔任發展印尼經濟的重責大任，對於宮澤的來訪自是歡迎有加。另一方面，印尼是目前不結盟運動組織（Non-aligned Movement）的領導者，自不願加入區域性的安全組織而違背不結盟運動之宗旨。是以印尼總統蘇哈托（President Suharto）在接待宮澤首相時大談經濟發展、南北對談（North-South Dialogue）等經濟性問題，對政治問題較少提及。而由民間的傳播媒體表達對日本軍事任務增強之憂慮。³⁵

最後對隔鄰的中華民國來說，亞洲安全體系的建立一直是李登輝總統近年來所倡議的主要議題之一。現在得到日本首相的呼應，中華民國政府的欣喜是可以想見的。不過在台灣的傳播媒體及知識界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仍抱著極為疑慮的態度，因此官方和民間對此政策有不同的反應。基本上，中華民國政府和大多數東亞國家一樣認為：亞洲安全體系的建立可以滿足東亞各國對地區性穩定和平安全的殷切需求。

五、結 論

最後所要探討的是在「宮澤主義」的亞太政策中，中共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在宮澤喜一的演說中並沒有明白的提及，這是否表示這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絕對不是。事實上，日本比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來得明瞭，以中國大陸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在二十一世紀時，中國大陸會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大經濟體，而這十二、三億人的市場，也絕對是日本經濟永續發展的重要市場之一。從過去中國大陸十四年間開放政策導致經濟成長大幅提高的經驗來看，日本人相信祇要持續維持和平與穩定，中共的體質會因此而改變，會逐漸從以前「潛在的敵人」轉變爲經濟上的競爭者。因此宮澤主義所主張的日本加強和亞洲各國的經貿援助和合作計畫，亦有經由此方式達到逐步占領中國大陸這個廣大市場的目的，當中共在科技及經貿上的依賴程度達成愈來愈高時，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祇會帶給日本更大的經濟利益，這應該是「宮澤主義」背後的長程戰略構想。因此從戰略觀點來看，中國大陸願不願意、或應不應該加入這個體系倒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³⁵ Japan Times, January 12, 1993, pp. 1 & 5.